

書評《一個由拿取者組成的國家：美國的應享權益流行病》 Book Review “A Nation of Takers :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¹

劉華宗

Hua-Tsung Liu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一

2008 年美國紀錄片 I.O.U.S.A. 探討美國正經歷四大赤字危機，分別是預算赤字、儲蓄赤字、國際收支赤字、以及政府領導能力赤字。紀錄片雖未明言要選民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但其內容卻將矛頭指向共和黨需為美國赤字危機負最大責任，尤其面對美國政府領導能力危機，它呼籲選民應該站出來投票以拯救危機。該紀錄片在美國正式播映時間是 8 月 22 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 9 月 15 日宣佈破產，該紀錄片頓時炙手可熱，成為理解美國赤字危機及為歐巴馬助選的最佳宣傳影片。

A Nation of Takers :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 一書，出版日期是 10 月 19 日，離 2012 年 11 月 6 日美國總統大選日僅十多天，如果因為該書的理念與共和黨保守立場較接近，就將該書視為是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助陣，則貶抑了該書的企圖心與其價值。事實上，此書毫不客氣指出，單從統計的觀點來看，美國應享權益支出的成長，在過去半個世紀，共和黨政府比民主黨政府還來得多，對於今日應享權益支出的爆發，兩黨都很努力、也很有默契的共同點燃，也要負最大的責任。因此，看待此書應跳脫為某黨宣傳理念的意味，而毋寧視為在總統大選前的重要時刻，引發美國民眾對此問題的深刻思考。

本書內容基本上有三部份組成，第一部份是 Nicholas Eberstadt 論述美國民眾對政府提供應享權益的依賴逐漸成長，第二部份是 William A. Galston 及 Yuval Levin 針對前文論述分別提出不同的觀點，第三部份則是 Nicholas Eberstadt 針對前面兩位指教的回應。

¹書名：A Nation of Takers :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

作者：Nicholas Eberstadt

出版年：2012

出版商：West Conshohocken, PA : Templeton Press

頁數：144



二

Nicholas Eberstadt 以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官方統計資料作為分析數據，包括：過去半個世紀政府移轉給個人應享權益的總金額、成長倍數、平均每年的成長比例、通膨調整後的應享權益支出上漲倍數及上漲百分比，過去廿年應享權益支出在調整通膨指數後與人均所得成長做相比，透過圖文並茂的呈現，令人不禁對應享權益支出的驚人成長，瞠目結舌，印象深刻。

在 1960 年之前，僅有兩個年度（分別是 1931 年與 1935 年），美國應享權益的聯邦移轉支付超過其他聯邦支出。在大部份羅斯福總統任期內，以及大部份的大蕭條時期，聯邦支出在所得移轉部份是佔所有支出的三分之一或更少。

在 1960 年應享權益移轉支付還不到聯邦政府總支出的三分之一，大概等於 1940 年。然後大約十五年時間，應享權益佔所有聯邦支出比例，突然從 28% 躍升至 51%。之後就沒有再超過 50%，直到 1990 年代。但自 1990 年代，它上升速度就毫無停止，到 2010 年已佔全部聯邦支出的三分之二，而其他聯邦政府應該負責的國防、司法、及其他憲法所列的職權則只佔其餘的三分之一。美國政府職能，可說是已被被應享權益事項所霸佔與徹底翻轉。

三

美國何以淪落至此？Eberstadt 認為，政治文化的逐步改變，從「獨立」逐漸轉變為「依賴」。在將近兩百年前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時，其印象最深的是美國人獨立、自主、負責任的精神，因此造就許多個人企業與實業，同時極端厭惡依賴，輕視任何行乞求施捨，認為接受幫助與施捨，就是對其尊嚴與獨立的公然侮辱。然而，自二次戰後人們逐漸轉移到對應享權益的依賴，其背景與原因相當複雜。現在的美國所提供的福利已不只是從搖籃(甚至是從搖籃前)到墳墓；政府所提供的諸多寶貴公款利益，是對所有美國公民開放，並已實現成為個人合法權利；對於這麼多的利益誘惑，現在這已成為美國生活方式的一部份。

美國人對應享權益的依賴，政府的大量提供與持續性的投入，及新點子的包裝，都使問題更加惡化與嚴重。2008 年小布希總統簽署通過補充性農業法案 (Supplemental Farm Bill)，透過法案以塑膠卡片「電子福利轉帳」卡 (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 (ERT) card) 為替代，正式告別食物“券”(stamps) 及“折價券”(coupons) 的污名化字眼。此外，歐巴馬則為美國政府提供新的終身系列應享權益表達讚揚，並作為其 2012 年再競選的廣告 (Life of Julia)。以一個想像女人 Julia 為廣告主角，談到她受到政府的照顧而受益，從學前教育、到懷孕分娩、到工作貸款及退休金等。應享權益及社會福利項目再也不是需要勉為其難的辯護，取而代之是積極稱頌，這已成為美國夢的一部份：不但承諾要予以維護，並且要進一步增加它們的範圍。

應享權益的接受現在已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現象，這對曾經是獨立宣言的繼承者而言，是一項令人驚訝的轉變事實。對應享權益的依賴，隨之而來的將是巨



大的成本。

四

Eberstadt 認為移轉支付的反面影響之一，是對美國家庭價值和家庭形成，其鼓舞沒有父親家庭的擴張。儘管協助家庭中有依賴兒童的計畫(Aid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當初是提供給孤兒，到了 1980 年代早期，父系家庭的孤兒大約佔 AFDC 的 1%案量數；但是到 1982 年，幾乎有一半 AFDC 案量數，其符合資格是因為母親是失婚的，而五分之三的兒童接受 AFDC，其母親是從未結婚的。也就是說，AFDC 和相關的受益項目，毫無疑問成爲支柱美國單親母親和離開婚姻生活狀況的一項工具。

在應享權益年代之前，自食其力及工作守則最主要的、不可分割的是美國男子氣概的典型。身體健全的男人不能夠自我維持生計是會感到羞愧的，稱此爲偷懶的、沒志氣的、無能的(shiftless)，並且會被其他美國人(不論年齡、性別、族群)輕視看不起。然而，當今的世界已完全不同了。對於工作尊嚴，再也不像早期那樣對男人相同的要求。經過幾個世代，美國已經接受大的轉變----男人沒有工作，即便是工作機會仍普遍存在及工作機會普遍爲女人佔據。

美國男人在偉大的戰後如何使離開工作成爲一種可能？這是應享權益社會的一種產物。退休、收入維持、失業保險以及其他的移轉性支付，使得只要一小部份的成年人投入工作，這成爲一種可能。

對美國男人來說，工作已不再是個責任(duty)或必需品(necessity)，而寧可說是種選擇權(option)。當美國男人把工作與否當成是一種選擇，應享權益國家已逐漸侵蝕先前世代“男子漢美德”的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男子漢美德拋棄健全身體的男人，成爲受社會的保護者。

五

當依賴政府資產過活的歷史污名消失，以及依賴官方資源移轉的生活型態正常化，一般美國人已經開始轉變他們著名的企業精神，不只是從既有應享權益體系極大化的拿取，並且從移轉性支付國家中去汲取支出。Eberstadt 表示，在這樣的環境中，詐欺應享權益體系，已成爲當代美國一種大眾現象，一種數百萬人的生活方式，這些人甚且毫不懷疑及遲疑地表明，他們是遵守法律及愛國的美國公民。

當今美國應享權益的欺詐，並不限於有困難的下層階級。相反的，它是當今勞動美國、甚至認爲自己是中產階級的美國的特色。在美國團體中，傾向依賴美國政府失能補助，白人族群有愈來愈多的傾向；像西維吉尼亞州、緬因州都是。

支領失能應享權益的年齡也是逐漸在下降。以 1960 來說，6.6%的男人及 6.4%的女人殘障(失能)是在三十幾歲或四十初頭，但到了 2011 年前述對應數字各別上升到 15%及 16.2%。愈來愈多的美國人，似乎是在取得失能資格，作爲他們長



期生活的職業。蒐集殘障失能在美國，已逐漸成爲重要的“職業”。在 2011 年的 12 月，有 860 萬的工人是 OASD (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OASD) 失能者，150 萬是因爲情感性疾患(mood disorder)，250 萬是因爲肌肉與骨骼的系統和結締組織疾病。這兩者加起來合計佔所有失能者診斷的將近一半。在 1960 年，相對的肌肉與骨骼問題和心理疾病佔所有失能者授予津貼者約五分之一。

在 2011 年末，相當多的美國人“受僱於”(以擁有固定收入來源的某種角度來說)政府的失能，而非建築、或交通與倉儲行業，並且人數是三倍於資訊科技服務業。以總勞動力來說，今日工人在失能支付已幾乎等於整個美國的製造部門的聯合，以 2010 年 12 月 100 個產業工人，有 73 位“工人”收到 OASDI (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OASDI) 支付，同一年更多的美國人勞工年資，正在從某些政府計畫支領失能支票，而非從任何美國的製造業。

2011 年財政年度，社會安全機構支付超過 1300 億給失能保險(Disability Insurance, DI)計畫。另外 560 億給補充安全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計畫，很多的收受者是由於工作失能而符合資格的。根據國會預算管理局的最近預估，社會安全的 DI 基金依照目前速度將在四年內破產。

六

理論上來說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與醫療照護(Medicare)，是指自己提供財務的社會保險計畫，藉由登記參加者的年金給付，在工作的那幾年負擔退休及以後幾年的需求。

Eberstadt 指出前述兩者計畫，從來就沒有真實落實要這些登記爲成員的最後受益者，從勞動中貢獻去自我支付以維持。反而，他們依賴從現有工作者中的貢獻去維持當前的收益者。前述那些安排與計畫，著名的口號“量入爲出”爲手段。儘管社會安全與醫療照護正式支付是從官方建立的信託基金，實際情況是這些支出並非透過受益者過去的儲存(註：醫療照護已有 45 年的運作，社會安全已有 75 年)。取而代之，他們以之後的一群人收入所賺的資源爲花費。實際上，兩代之間資源轉移計畫(今日取用者靠這個，很少例外)，花用消費的正是犧牲那些在他們之後出生的下一代的。

七

在 1961 年艾森豪開始勸誡應該注意軍事工業複合體可能造成危險時，美國財政在國防上與國內應享權益支出比，差不多是花費兩元在前者，同時則是提供一元的支出在後者。但自 1961 年起，應享權益支出開始了大幅成長，支出呈現出一股不能緩解的趨勢，在十年間政府移轉給個人的開銷開始超過國防支出，此時越戰仍在熱戰中。隨之而來的四十年，應享權益持續超越國防支出，並且逐漸擴大差距。到了 2010 年，美國的移轉性支付是整個國家安全預算(包括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海外的軍事行動在內)的三倍。



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軍事支出的躍升是爲人所知的。但較少爲人所知的，軍事開銷的大幅支出，與巨大的國內應享權益支出擴增，在同樣的時期相比，則是相形失色。2001 年的財政年度，美國花了 3050 億美元在國防上，2001~2010 年，累計爲 5.05 兆美元。換句話說，在過去十年美國多花了 2 兆美元在國防上。相對而言，美國在 2001 年花了 1.13 兆美元在應享權益支出上，十年累計達到 16.03 兆美元。如果同樣以 2001 年爲基線，則是多花了 4.8 兆美元。以這樣的計算標準，過去十年的絕對成長，應享權益支出的增長是國防開銷增長的兩倍半。

2012 年的政府開支緊縮，國防預算首當其衝，衝擊最大。至於應享權益項目預算則是毫髮無傷。Eberstadt 認爲這樣的違逆、不負責任的作爲，將使這些國家的拿取者更肆無忌憚，並且將可能置國家安全陷入難料的處境。

八

一個有害的「不勞而獲」思想其無可避免的後果，在當代應享權益者的心中，是透過民粹手段訴諸於重新再分配的政治。

Eberstadt 認爲兩個關於政治環境的重要事實，正在形塑政治再分配的動力。第一，贏得成功，正在被去正當性。歐巴馬總統在 2012 年 7 月 13 日在維吉尼亞州的競選談話，暗指企業家沒有盡到他們相對成就該盡的義務，並且他們的財富是由於先前政府在基礎建設的支出以及孵育提攜所致，並且敘述成今日美國的財富需歸功於政府應享權益計畫，個人的努力對成功貢獻是有限的。

第二，美國家庭收入差距逐年不斷擴大中。由於或多或少穩定上升的“收入不均等”，逐漸要求更明確的再分配政策——不論是矯正美國經濟體系結構性失能，或者是透過新凱恩斯主義花費項目來刺激繁榮，或者是兩者都要。

不勞而獲政治需要藉口來合法化其行爲，而最方便的公式化藉口，拿取 (takings) 是種權利 (claim)，因爲美國充滿機會的社會已再也不能真正運作了。

在今日華盛頓決策圈內，觀察到美國全國渴望應享權益利益，已經使這個國家在財政上走上難以維繫的道路，聯邦預算(應享權益製造機)最後將產生難以支撐的支出及公共債務，這是已非常接近於一致的看法。2010 年美國兩黨 Bowles / Simpson 委員會坦白的指出，“我們國家正走在難以維持的財政道路上”。相同的觀點已在國會被多次提及，如：國會預算局(CBO)，以及當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CEA)會負責人，財政的不均衡已在軌道上，將在十年內有公共債務危機，並且要避免此危機，將需要比過去政策制定過程還要嚴肅考慮及更大改變。

九

在 Nicholas Eberstadt 蒐集一連串實證趨勢來證明一個道德性結論：應享權益國家的成長，在過去半個世紀已逐漸侵蝕強固的自我依賴、自食其力，那種長期以來被標誌爲美國特色，取而代之是依賴的文化，不僅扭曲了美國政府，更且



威脅美國的運作。如此宣稱引起兩大問題，這樣的趨勢代表一個完整且公正的說明，從 1960 年以來所發生的嗎？其次它們保證這樣的結論是正確的嗎？以下是 William A. Galston 的回應。

Eberstadt 的圖表及統計數據精準地呈現了他想關注的趨勢。但它們並非是全部的事實。首先，Eberstadt 的說明，並未包含所有那些形成應享權益(如同他所定義的)的公共政策。稅式支出—特殊減稅或免稅，以及稅收抵免—現在每年超過 1.1 兆美元，而他們是不成比例地由高所得家庭受益。

在 1979 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到 54% 聯邦政府的移轉性支付，但到了 2007 年，那個數字已下降到僅有 36%，下降了三分之一。在那段期間，另一種算法，低工資或沒工作的成年人的家庭得到的愈來愈少，當中產或中上階級得到愈來愈多。假如有依賴成長的問題存在，這些數字所建議的是存在於美國的中產階級而非貧窮或近貧窮階層。

對於過去半個世紀美國社會的變化，最起碼有三個長期循環趨勢需要被考慮。首先，它是一個老化的社會。巨大投資在公立學校及大學擴張是在嬰兒潮的高峰，現在則是逐步讓位給籌建醫院與療養院。老化會帶來擴大需求包括複雜和昂貴的醫療程序，那將會超過平均家庭的資源。第二個趨勢，加速惡化老化的結果：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幾十年期間，給退休人員的年金及健保幾乎消失。當美國支配全球產業經濟，使得僱主有能力付出高昂價錢，去支付慷慨的合約給工會受僱者。當受創的歐洲及亞洲逐漸恢復其強化的國際競爭力，戰後的美國其討價還價能力就不見了，政府只好被迫跳入收拾爛攤子。第三個趨勢是總體經濟。二次大戰後世代間，經濟快速成長，而且成長成果為廣泛分享。但是從某個時期起，成長開始減緩，成果的分配開始變得愈來愈集中在高層。在 1947 年和 1973 年之間，底層五分之一家庭收入上升 117%；中間的五分之一，上升 103%；最上層的上升 88%。相對的，從 1973 年到 2000 年，底部五分之一上升僅 12%，中間部份上升 25%，而最上層上升 66%。從 1973 年，同時間，更高的教育經費及健康照護費用成本快速上升，比家庭收入來得快，逐漸增加的壓力迫使公部門介入其中。這些因素就是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為什麼聯邦政府承擔主要的責任。

十

Galston 認為依賴和獨立是一對詞，但太粗糙以致於難以掌握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因此必須考慮第三個詞“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以及相互作用(reciprocity)的規範。當我為你做些什麼，你可能對你自己感到壓力，而你的回應則是在我有困難時協助我，我們彼此相互依賴並且因此愈來愈強大。

當我們同意減除我們的薪水去幫助籌集我們父母的退休金，它也存在著這樣的期待，我們的小孩將會如此為我們這麼做。這樣的契約實務上是可持續性的，並且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但唯一的附帶條件是，和我們自己願意承擔的付擔相比，我們加諸小孩的負擔不可是不成比例性的。相互依賴這個詞是相當重要的，不只是個事實而已。並且，把它提到實際案例，假如我們能夠以對當前勞動世代美國



人履行承諾為榮，卻只是強加更重的犧牲給下一代，那就可說是走錯路了。但用“依賴”這個詞，是這個問題的錯誤特質。

關於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那是用來補充低工資工人的所得。從福特政府開始，全職工作者、終年下來不應仍處於貧困，他們的家人也是應該如此。市場工資如果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公部門應該介入填補空隙。當這些低工資的工人無法自足，他們也不是依賴，因為依賴是一種事態特徵(a matter of character)、不是算術。

1996年福利改革的工程師之一 Ron Haskins 指出，改革後的公共支出通常比他們想要取代的 AFDC 來的高。政府補助交通、小孩照顧及健康照顧，但只有這些受益者接受進入有工資的勞動市場，並工作一段合理時間。從某個意義來說，這些個人是比原先的舊體系，更加的依賴公共支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則是變得愈來愈少依賴，因為他們正在承擔更多的責任去提供給他們自己與家人的所需。

當小孩依賴他們的父母時，我們絕不會感到那是麻煩----那本來就是該如此做。當我們關懷老人，那些依賴家人照顧及協助的老人，我們在道德上不會覺得那是種麻煩。幫助那些已盡力去為他們自己提供協助、但是不能夠做的很好的成年人，在這個社會上那是可以接受的。我們需要關切的是，那些可以做得更好以幫助他們自己的人，但他們卻選擇不去做，那才是種依賴，才是真正困擾著我們的問題。

十一

從十七世紀以來，哲學家就已經在倡議要擴展科學知識以解除人們的苦難，延長壽命，甚至摒除死亡。直到最近，以研究為基礎的醫療進步才使人類的期待成為可能。開心手術、器官移植、關節置換，這許多的改革幫助了數百萬人能夠比他們的父母能夠活得更久更健康。但即便表現得這麼有效率，這些程序仍然需要尖端科技以及訓練有素的執業醫生。這些本質上都是需要高昂費用的，並且因為人們正在冒風險，很難去爭論所得高低應該來決定個人是否有接近使用權?! Galston 強調救人第一，不應該由收入多寡來決定。

十二

當人們在工作時有皮肉痛苦或精神折磨，與乾脆完全不工作，被要求做二選一的抉擇時，部份人會選擇享受利益，而非咬緊牙關挺下去。假如社福計畫不存在，他們也就沒這個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社福計畫是在鼓勵財務上的依賴(financial dependence)。

Galston 指出，這不必然是一個深刻的文化變遷的證據。想要不勞而獲的欲望，是一個難以磨滅長久存在的人性，不是直到二十世紀才有的發明。美國的歷史一直充斥著欺騙行為和快速致富的詭計。



Eberstadt 很少去處理所謂的依賴的文化，那個證據充其量是薄弱的。Galston 強調，只要我們做好我們的部份，那將無法傷害我們從(我們協助支撐的)計畫中獲益。只要我們貢獻我們的部份，拿取在道德上是沒有問題的。我們能夠成爲一個拿取的國家，只要我們也同樣是一個給予的國家即可。只要我們能夠對我們同胞與對繁榮以互惠爲規範而驕傲，我們就能駛向一個穩定的未來。

十三

Yuval Levin 針對 Nicholas Eberstadt 的論著，主要是從公民社會與應享權益國家間關係切入。Levin 認爲，Eberstadt 指出福利國家的上升，已造成政府的改變及公民身份的改變，但 Eberstadt 並未將此兩種改變合在一起，進一步探討其所隱含對美國政府自治特色的重大威脅，並協助我們去瞭解解決的可能性。

關於美國政府的功能與角色，自由派與保守派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保守派抗拒聯邦政府的擴張範圍及角色，以維護個人的基本權利與成就。自由派則是批評前者是激進的個人主義，完全拒絕所有人共同努力和社群承擔的面貌。Levin 認爲，我們的社會不是僅有個人(individuals)與政府(the government)，事實上我們大部份的生活是存在於那兩者之間，如：家庭、公民社會、私經濟，在相對自由的情況下使其蓬勃發展。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國家正闖入那私人生活空間並嘗試去填補它，或者藉由政府的力量去瓦解那個存在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空間。福利國家的成長，使得我們的負債也跟著成長，同時挪用下一代的財富以滿足當前世代的物質所需。而獲得政府利益者，已不再限於窮人，連中產階級也開始接觸政府成爲請求者。當自治公民開始依賴，福利國家的持續成長，逐漸的民主共和的精神與特質陷入險境。

應享權益國家除了耗盡公民能量外，它也是巨大的無效率。在我們每日的生活，官僚它本身所呈現並不是一個仁慈的提供者及弱勢的保護者，它僅是一個遲緩、臃腫、不負責的、無回應的龐然大物。大致上它是沒有任何競爭力的，大部份的行政機構不必直接回應公眾偏好，並且已經發展成使它們本身的運作更爲容易，或者它們的員工更爲滿意的方式。

很多人說，美國的政治體系是被分裂所癱瘓。Levin 認爲那是個誤診。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已著手大規模稅改的執行(布希減稅)，巨大的教育改革，國內安全部門的重組，公司治理的改革，金融危機的巨大回應(包括許多的刺激方案、史無前例的銀行拯救、汽車公司的緊急財政援助、以及更多不同政黨的跨政府措施)，龐大的健康照護改革，龐大的金融規範改革，以及十年緊縮支出上限的預算方案。和過去相比的話，這是美國一個主要聯邦立法的積極時刻。

但唯有一件事不能做：不能表達帶給美國財政危機的，是這個福利國家。並且很有默契的，沒有人想要談那個危機。大家只想要讓這些利益持續流動，但並不要付出代價。所以利益持續成長，並且負債也會持續攀升。Levin 認爲不能夠表達這個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負責任的自治政府最明顯的失敗。



對於健康照護，政府應該使用它的資源去創造市場及使其競爭，而非去取代市場並指揮供給與需求。政府不應該尋求代替私人經濟、公民社會及家庭，但應該強化它們，並且使窮人與脆弱的人去接近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空間，那才是人類能夠真正興旺的正途。

十四

Eberstadt 對於 Levin & Galston 兩位友人尖銳與值得深思的意見，除了表達謝忱，也指出兩人關於應享權益困境的挑戰，採取的是不同研究路徑。

Galston 陳述應享權益計畫的趨勢並沒有呈現一個完全向上的軌跡，並且強烈受到特別的社會和總體經濟變遷的影響。但 Eberstadt 反駁，其實情是應享權益計畫已經吸收愈來愈多美國國家資源(從過去每隔十年的數據來看)，並且登錄作為受益者是我們總人口的愈來愈大部份(同樣以每隔十年來看)。而美國人在態度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稱之為“救濟”(relief)，現在則是改為眾人周知的“福利”(welfare)。

至於 Galston 完全不同意“美國已經成爲一個拿取者的國家”的看法，並且強調相互作用、互惠(reciprocity)在我們社會政策、社會關係中的重要性。然而關於應享權益系列，Eberstadt 也毫不客氣地回應，它實際上就是缺乏互助。理論上，Social Security 及 Medicare 是社會保險計畫——並且保險的安排是意指具體實現互助及團結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reciprocity and solidarity)。事實上，它們從來就沒有精算地穩健過，它們能夠存續一段長時間，純粹是藉由從沒有參與它們計畫的外面人士來汲取資源。相反的，造成當代應享權益國家問題不斷上升，民眾不勞而獲的心理因素佔了重要成份。

Levin 認爲應享權益病狀另一個更大疾病的徵兆：放棄自我管理的責任，那是一個成功的憲政民主所依恃的核心。Levin 偏好看到應享權益的改革進步，包括兩部份：共識的及倫理爲基礎的。然而，這樣的轉型它是比較容易的去展望、而非實現。這樣的轉型要有成效，Eberstadt 非常懷疑，如果美國沒有經歷過一個長期的、顛簸的、及痛苦的政治鬥爭過程，那將不太可能。Eberstadt 同時相當納悶，美國是否已到了危機，也沒有其他替代選擇，所以要投入去根本改革應享權益系統？否則這個問題將會持續折磨美國社會。

Eberstadt 的論述，除了 Levin & Galston 點出的問題外，事實上他部份圖表數據的說明與論證，筆者也覺得太過簡略或說明不清，譬如 1960~2010 年應享權益支出的成長，共和黨總統(政府)比民主黨來的多。這和我們一般認知的常識有很大落差。究竟是因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長期主導預算政策？還是共和黨高舉的小政府只是競選口號，實際上爲求勝選執政，也採攏絡收買民心的應享權益體制？這些法案的通過誰是主動、誰是被動？那個政黨是主要的提案者？這些在正文撰述中隻字未提。儘管類似爲佐證主題而說明不清之處仍有不少，但整體而言本書仍是瑕不掩瑜。畢竟應享權益支出膨脹問題，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將面臨挑戰，只是嚴重程度不一。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書的不同觀點，值得識者省思



與探討。

